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德] 黑格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德〕黑格尔著

贺麟 王太庆译

目 次

第一部 希腊哲学

第一篇(续)

第二章 第一期第二阶段 :从智者派到苏格拉底	
派	2
甲、智者派	4
一 普罗泰戈拉	27
二 高尔吉亚	34
乙、苏格拉底	41
一 苏格拉底方法	56
二 善的原则	68
三 苏格拉底的命运	98
丙、苏格拉底派	119
一 麦加拉学派	126
1 欧几里德	127
2 欧布里德	129
3 斯底尔波	138
二 居勒尼学派	143

1 阿里斯底波	144
2 德奥多罗	151
3 赫格西亚	153
4 安尼克里	156
三 犬儒学派	157
1 安底斯泰纳	159
2 第欧根尼	161
3 晚期犬儒派	166
第三章 第一期第三阶段 柏拉图与 亚里士多德	167
甲、柏拉图	167
一 辩证法	221
二 自然哲学	248
三 精神哲学	269
乙、亚里士多德	298
一 形而上学	319
二 自然哲学	338
三 精神哲学	370
1 心理学	371
2 实践哲学	397
(1)伦理学	397
(2)政治学	402
四 逻辑学	406
* * *	
译者后记	430

第一部

希腊哲学(续)

第一篇 第二章

第一期第二阶段：从智者派到苏格拉底派

在这第二段时期里，我们应当首先考察智者派，其次考察苏格拉底，然后考察狭义的苏格拉底派。柏拉图是从苏格拉底派里面分出来，与亚里士多德一起考察的。No0s（心灵）目的，最初是以非常主观的方式来理解的，即是把它了理解为人的目的（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则是以普遍的客观方式来理解它的，把它理解为类、理念。由于把思想理解为原则，所以原则最初带着主观的外貌。由于思维是主观的活动，因此进入了主观反思的时代，开始把绝对设定为主体。近代的原则便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与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瓦解同时。

由于阿那克萨弋拉的“心灵”还是完全形式的自身规定的活动，规定性还是很很不确定的，因为他的规定本身完全是一般的、抽象的，因而我们还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内容，所以当前的要求在于由普遍的观点进而达到一种内容。那作为自身规定的活动的抽象思维，给自己提出来的绝对普遍内容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这里开始要加以确定的实在问题。古代哲学家们的一般思想，我们是见到过的，到了现在，意识与他们那种朴素的思维相对立了。当主体反思到神、反思到

绝对的时候，便产生出思想，有了这种内容在眼前；不过这里所呈现的这种内容不是全部罢了，——而进行思维的主体，即思维的主观性，本质上仍归属于客观的总体。这种主观性〔一方面有〕这样的规定：主观性是无限的、自身关联的形式；它是一种纯粹的活动、一般的规定作用、那具有这种形式的共相，因而保持着一些规定、一种内容，——而主要的问题，在这里就是关于内容的规定的问题。主观性的另一方面是：主体乃是这个思维，这个设定者，——于是意识就要反思到这个主体的活动；——在这一反思中，精神便从客观性回复到它自身。思维首先是深入到对象之中；但是，和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一样，它还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因为内容是在另一方面〔按即对象〕。随着思维的回复，由于意识到主体是思维者，于是便结合到另一方面〔按即对象〕，而思维所应当做的，就是去获取一种本质的、绝对的内容。这种内容，抽象地说，可以是一种双重的内容。作为规定者的“我”，就规定的形式这一方面说，是本质的，因此，首先内容是“我”自身，是“我的”，我有这些兴趣，并使这些兴趣成为内容，其次，内容又被规定为具有完全的普遍性。关于这两种观点，问题在于：自在自为的存在这一规定应当怎样来理解？自在自为的存在又和作为思维者的“我”有怎样的直接关系？哲学理论中一般要看什么是对象、被思维者的内容而定，——“我”是设定者；虽然我作了这样的设定，而我所设定的东西却是客观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如果有人还坚持说“我”是设定者，那就是近代的坏的唯心论了。在古代，人们曾经思维过，但没有人坚持：被思维者所以是坏的，是因为它是我

设定的，是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这里我们所讲的是智者派、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派。〔在智者派看来，内容是我的，是主观的。苏格拉底把握住了自在自为的内容，〕苏格拉底的门徒们和他有直接关系，只是进一步规定了这内容。

甲、智者派

理性在阿那克萨戈拉那里所发现并认为本质的概念，乃是简单的否定，一切特定性、一切存在和个别的东西，都消逝到这个否定里。在概念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存在；概念正是无任何宾词的绝对，对于概念来说，一切东西都毫无例外地只是一个环节；从概念看来，可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钉牢的和固定的。概念正是赫拉克利特的那个流转变迁，那个运动，那个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抗拒的腐蚀性。于是这自己发现自己的概念发现自己是绝对的力量，在这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归消逝；——一切事物；一切存在，一切被认为固定的东西，现在都成为流动不居的了。这个固定，不论它是存在物的固定性，或是一定概念、原则、习俗、法律的固定性，现在都陷于动摇，失掉它的稳固了。原则之类的东西，本身是系属于概念的，是被当成有普遍性的；但是普遍性只是它们的形式，它们所具有的内容既是确定的东西，于是就陷于运动了。

这种运动，我们将在这里初次遇到的所谓智者那里看到。他们自称为（智者），乃是能够使人智慧的智慧教师。智者是和我们所谓博学正好相反的，博学只是追求知识和搜寻现在与以往的事物，——搜寻一大堆经验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新的蠕虫或别种害虫和蛆虫，就被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就这一点说，我们博学的教授们负的责任要比智者小得多；但是哲学与没有责任是毫不相干的。

说到智者与一般人的看法的关系，他们是既为健康常识所诋毁，也同样为道德所诋毁，因为：（一）他们的理论学说主张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这应当是一种胡说；（二）在实践方面，则把一切原则和法律都推翻了。

首先不可仅仅根据运动的消极方面而停留在万物运动这一糊涂状态中，但是运动所过渡到的静止，亦不复是运动的事物恢复其固定状态，以致最后又出来了原来的东西，而运动只是白忙一顿。然而那既无思想修养又无学识的一般看法的诡辩，却正是这样一种诡辩，把运动的各种规定本身当作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实体，把一大堆生活规条、经验规则、原则之类的东西当作绝对固定的真理。精神本身乃是这些各式各样的真理的统一；在精神里面，这一切褊狭的真理只是作为被扬弃的真理而存在，只是被认作相对的真理，——换句话说，只是作为有限制、有局限的真理，而不是作为自在的真理而存在。这些真理在通常理智〔按即常识〕看来事实上不复是真理。通常理智换一个场合会承认相反的道理对意识也同样说得通，甚至加以主张；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所说的和

所想的正好相反，——通常理智的表现只是矛盾的一个表现。通常理智是在它的一般行动中，而不是在它的坏的行动中，破坏它的那些准则、那些原则。假使通常理智是过着一种理性的生活的话，这种生活认真说来也只是一种经常的自相抵触，即是借违背另外几条行为准则而谨守某一条褊狭的行为准则。例如；一个有处世经验和有教养的政治家，是懂得取乎中道，有实践的理智的，这就是说，他是就当前问题的全面来作处理，而不是仅就问题的一面（一面的意思就是从—一个准则出发）。不管是谁，也不管在什么场合，要是只按照一个准则行动，他就是一个迂阔的人，不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会把事情搞坏。这种情形也是极普通的。例如，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我所看到的东—西确乎是存在的；我相信它们的实在性”；但是实际上他相信它们的实在性这句话是不实在的，正好相反。因为他吃喝这些东西，这就是说，他相信这些东西不是自在的，相信它们的存在没有稳定性，没有实在性。由此可见，通常理智在行动中比在思想的时候要好些。人的行动本质是完整的精神，不过人尚未意识到自己是精神：凡是人自己所意识到的，都是法则、规则和一般的命题，这些都被他在意识中认为是真实的；而在行动中，他才抛弃掉他的理智的局限性。但是这个意识却把这种特定的存在和—般的存在说成绝对实体，称它自己的意识、它自己的理智为绝对实体。当概念转向那意识自信为真实拥有的丰富内容时，当意识感到自己的真实性有危险时（因为意识知道，没有真实性，它就不能存在），当意识对自己的固定的抽象概念感到迷惑时，意识便会激怒起来。概念在这种想要实现它自己的情

况之下，亦即在从事于普通真理时，就会憎恨并咒骂它自己。这就是一般人对于诡辩 (Sophisterei) 的指摘，这是健康常识不可避免的一种指摘。

诡辩这个字是一个坏字眼。特别是由于反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缘故，智者弄得声名狼藉。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我们要把这个坏的意义抛在一边，把它忘掉。相反地，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从它的积极的方面，严格地说，即是从科学的方面，来考察智者们在希腊究竟占据什么地位。

第一。正是智者现在把作为思想的简单概念（在爱利亚学派中，芝诺已经开始转到思想的纯粹摹本，转到运动上去），一般地应用到社会对象上去，并且使它深入到一切人事关系中去，因为概念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是绝对和唯一的实体，排斥其他一切，要求影响那不是思想的特定事物，对它们施展自己的势力和统治权。自身同一的思想把自己的否定的力量指向理论和实践的各种规定，指向自然意识的各项真理与其他各种自明的法则和原则。凡是一般观念认为固定的东西，在这思想中便分解了，于是思想倒向特殊主观性的一方面，使自己成为第一性的和固定的东西，把一切都联系到它自己身上。

由于正是这个概念现在出现了，所以它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并且不仅成为哲学，而且成为一切有思想的民族中任何一个人所参与和必须参与的一般教养。因为我们所谓教养，正是指这种应用于现实的概念，这概念不是指纯粹的

抽象概念，而是指和一切表象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相统一的概念。在教养中，概念确乎是占支配地位和起推动作用的，因为特定的东西是在它的限度之内，是在它过渡到它的对方的过程中被认识的。概念成了一般教育的内容，因此就有了一批教授辩论术（Sophistik）的教师出现。智者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他们代替了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宗教并不是教师，宗教中并没有教育内容。虽然祭司们牺牲献祭，作预言，讲解神谕，但是教育却是另外一回事。智者以智慧、科学、音乐、数学等等教人，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在柏里克勒之前，文化的要求已经通过思维而出现；人们要在他们的观念方面得到教育，智者便是以此为目的。他们以教育为职业。人们要求通过思想来决定种种关系，而不再仅仅通过神谕，或通过习俗、热忱和一时的感情，——这种反思的要求在希腊似乎已经觉醒了。国家的目的是有普遍性的，普遍之中也就包涵着特殊。智者传播了这种教养。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以教育为职业，接受报酬，代行学校的任务。他们周游各个城市，青年跟随着他们，受到他们的教导。

教养并不是固定的。进一步说，凡是自由思想所能获得的，都必须来自自由思想本身，都必须是自己的信念。它不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对象，一句话，它就是近代的所谓启蒙。思想探索着一般的原则，用这原则来判断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凡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就对我们没有价值。于是思想对积极的内容和思想本身进行比较，溶解以前的信仰的具体内容，一方面把内容分解，另一方面把这些

个别性、这些特殊的观点和方面孤立起来，把它们单独地紧紧抓住不放。这样，思想便获得了某种普遍的形式；人们为这种作法说出一些理由，亦即提出一些普遍的规定，而又把这些规定应用到特殊的方面。方面本来不是独立的，而只是一个整体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如果与整体分离开来，自己与自己相关联，这样，就成了普遍性的东西了。要有教养，人们必须熟习那些属于一项行为、事件等等的普遍观点，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把握这些观点以及那些事情，才能取得对于所求知的问题的直接知识。一位法官，是知道各种法律的，也就是说，是知道处理一件事情时必须考虑到的各种法律观点的；这些观点已经是独立的普遍方面，这样，他便有了一种普遍的意识，以普遍的方式来考虑事情本身。一个有教养的人，是知道如何对每一对象都有话可说，以及如何找出对于每个对象的种种观点。希腊人得到这种教养，应当感谢智者们。智者们教人向对他们有权威的东西去运用思想。智者们并不是真正的学者。他们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或者通过观念以使一件事情办得通。那时还没有离开哲学的枯燥到对人类全体、对人的本质方面都不关心的各种实证科学。此外他们还有着最普遍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的职业性政治活动；——这似乎并不是为了训练公职人员，却好像是为公职人员准备一种专门知识的考试似的。

智者们的活动，是和人们对智慧的追求分不开的。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群众和国家中构成权力，并知道我必须承认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权力，就被认为是有智慧的。因此柏里克勒

等政治家所以引起人羡慕,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有能力把别人安排到各得其所。谁懂得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归结到推动人们的那些最终目的上去,谁就是有权力的人。智者们的教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什么是世界上的权力,——什么是解决一切特殊问题的普遍思想,——这只有哲学才能知道;所以智者是思辨哲学家。他们要想使人知道,什么东西在道德世界起决定作用,以及是什么东西使人满足。人所具有的冲动和欲望,乃是统治人的权力;当人的欲望得遂时,人便满足了。宗教教人说,诸神是统治人的权力。法律也是统治人的权力;人服从法律时可以得到满足,人可以假定别人遵守法律时也可以得到满足。但是通过反思,人便不再满足于把法律当作权威和外在的必然性来服从了,人希望在自身中获得满足,希望通过他的反思,使自己相信什么是约束他自己的东西,什么是他的目的,和什么是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须做的事。

因此,智者就特别是演说术的教师了。演说这一个方面,可以使人能够在群众中获得声望,能够做出为人们谋福利的事情;因此演说术是迫切的需要之一。民主制度要依靠演说,在民主制度中公民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演说便把各种情况归结到权力和法律上面。但特别要依靠演说术的,是提出对一件事的多方面的观点,使人们接受其中与我认为最有用的东西有关的那些观点。这一类具体情况是有许多方面的:一个有教养的人要能够掌握这些不同的观点;演说术则善于把某一些观点提到前面,而把其他的观点搁置于后。亚里士多德的“正位篇”也涉及到这一点,这书提出了 $\tau\omicron\ \omicron\sigma$, 即范

畴、思想规定，我们必须遵照范畴，才能学习发言。但是最先从事于这些范畴的认识的，却是智者們。

这就是智者派所占的一般地位。至于智者們的通常作风，以及研究问题的情况，特别是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我们见到了一个完全确定的情景。柏拉图在这一篇中让普罗泰戈拉自己详细说明了智者派的艺术。柏拉图想像苏格拉底伴同着一个名叫希波格拉底的青年人，这人希望投到新到雅典来的普罗泰戈拉的门下，来学者智者們的科学。在路上，苏格拉底问希波格拉底，他所希望学习的智者們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希波格拉底最初答复说：“是演说术；因为智者是善于使人说话有力”，善于考察对象，并加以多方面的研究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或民族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善于说话的艺术。法国人是很善于说话的；我们称之为空谈。我们学法文，为的是善于说法国话，可是也是为了获得法国文化。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和一个善于顺利地掌握和表达一切观点的人相周旋，是觉得不舒服的。但是这一点并不是单纯的说话造成的，而是文化造成的。我们可以完全正确地掌握一种语言；可是如果没有文化，就不能善于说话。文化可以使精神具有各式各样的观点，使它即时想起这些观点，使它拥有一大批考察一个对象时所运用的范畴。因此，人们可以从智者們学得的技巧，就是顺利地掌握一大批这样的观点，以便依据这些观点即时地来考察对象。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确乎指出了智者們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规定”，因此难以知道什么才算是一个智者——（假若一个人要想研究哲学，那就是由于他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否则他就不需要研究它

了)——;他说,“然而,我们还是要前往访他。”

苏格拉底同希波格拉底一道走到了普罗泰戈拉那里,在那里发现普罗泰戈拉是在一大群第一流的智者和听众当中:“普罗泰戈拉走来走去,就像一个奥尔斐似的,用他的话语使大家听得入迷;希比亚坐在一张大椅子上,有比较少数的人围绕着;普罗第科则躺在一大群景慕者中间。”苏格拉底先向普罗泰戈拉陈述了他的请求,说“希波格拉底希望从他学习,以便经过他的教导而被培养成为政府中一个有声望的人物”,然后问他,“他们是公开和他讲话,还是秘密地和他个别谈话。”普罗泰戈拉称赞苏格拉底虑事的周到,回答说,“他们这样先事预防,是个明智的举动。因为智者们在各个城市中漫游,于是有许多青年人抛弃了父母和朋友,追随着他们,深信与他们交游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好(更聪明);因此智者们给自己招来了许多猜忌和妒嫉,”——因为凡是新鲜的事物都是招致怨恨的。关于这一点他讲得很详细,并且接着说:“可是我断言智者的艺术是古老的,但是那些运用这种艺术的古人,由于顾虑它会引起冲突”(因为无教养的人是敌视有教养的人的),“便给它做了一件外衣,把它遮盖起来了。”这种艺术乃是一般的文化,就是“一部分如荷马和赫西阿德的人在诗篇中所宣讲的,另一部分如奥尔斐和缪塞的人在秘法和神论中所藏匿的。我相信,有一些人,如塔仑丁人伊各,和那比现在活着的人都要高明的智者塞林布里亚人赫罗第科,也曾经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斯特方本第三一——三一四页;柏克尔本第一五一——一五九页。

通过体育艺术(运动艺术)表现了这种艺术;”——换句话说,“音乐”是教养人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他把智者的目的说成就是一般精神教养的目的,即道德、沉着、秩序感、精神的灵活;他又补充说:“凡是害怕这些科学所遭受的妒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遮盖和隐蔽。但是我想他们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政府中有眼光的人物看穿了这个目的,虽然一般人并未看出,只是人云亦云。如果这样做,就会使自己更加招怨,显得(被猜疑为)是个骗子。因此我走了相反的道路,公开承认而并不否认(ομολοε)是一个智者”(普罗泰戈拉最先使用智者这个名字),“而”我的任务就是“给人以精神教养,”和另一些人如荷马、赫西阿德等所做过的一样。

他继续说:“你问的是有道理的,我愿意回答一个有道理的问题。”现在进一步谈到了希波格拉底将从普罗泰戈拉的教导中获得什么东西,什么内容,什么技巧。“他不会遇到他在别的教师(οτν)那里会遇到的东西。因为别的教师是和青年们反对的;因为他们教学生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时,违背着学生的意志,把学生一直引回到他们正要逃避的科学和知识上去。可是到我这里来的人,学到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要向我求教的那个”普遍的“目的”。于是青年们坦率地来到他这里说:“我们要成为有教养的人,请教导我们,使我们成为这样,——但是你教些什么东西,以及用什么方法来教,这一点你必是了解的。”教授的时候,途径是任教师自己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第三一四——三一七页(柏克尔本第一五九——一六四页)。